

五代、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研究述评

杨 蕤

内容提要：五代、宋时期是陆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贸易路线、贸易方式、贸易主体等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虽然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段陆上丝绸之路的状况关注较少，但一些相关成果涉及到这部分内容。本文重点就五代、宋时期中原政权与陆上丝绸之路、辽、金政权与西方世界、西夏政权与陆上丝绸之路等内容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一并以评论。

关键词：陆上丝绸之路 中西交通 西夏 高昌回鹘 喀喇汗 西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11）03—0126—10

自唐末、五代以来，“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陆上丝路盛况不复存在，致使学术界曾有过唐末、五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断绝的观点。在一些有关丝绸之路研究的论著中，要么对这一段陆上丝路状况略略带过，要么只字不提。事实上，五代、宋辽时期是陆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贸易路线、贸易方式、贸易主体等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①，中西方的陆上交流通道不但尚未断绝，而且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内容。学术界对这一阶段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然少数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略微早一些。因此，本文主要针对近30年来关于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成果进行述评。

一、通论性质的论著

虽然五代、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不逮汉唐时期丰硕^②，但在一些有关丝绸之路或者中外关系通史性质的论著中，对于这一段的丝路状况还是给予了篇幅不等的关注。如向达《中外交通小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张维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张广达、王小甫《天涯若比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香港中华书局，1988年），

① 杨蕤《略论五代以来陆上丝绸之路的几点变化》，《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② 有关唐代丝绸之路及中西关系方面的研究，荣新江做了较为详实的整理和述评，参见荣新江《20世纪的唐代中西关系史研究》，收入荣新江《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有关20世纪丝绸之路研究的状况可参见李明伟《丝绸之路研究百年历史回顾》，《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陈爱峰，赵学东《西夏与丝绸之路研究综述》，《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国内学者尚有一些对于国外丝绸之路研究的述评或介绍，如耿昇《法国汉学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敬东《独联体国家的丝绸之路研究》，《丝绸之路》1993年第6期；胡小鹏编译《日本的丝绸之路研究动向与展望》，《丝绸之路》1993年第2期，等等。

张国刚、吴莉苇《中西文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黄新亚《丝绸之路·沙漠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刘迎胜《丝绸之路·草原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黄时鉴《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等。此外,雪梨主编的《中国丝绸之路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周伟洲主编的《丝绸之路大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有关工具书中也有不少涉及五代、宋时期路上丝绸之路内容的词条。

李明伟主编的《丝绸之路贸易史》是一部以丝路贸易为考察对象的著作,对丝路贸易史进行了阶段划分:秦汉时期为丝绸之路的开拓与丝路贸易的兴起时期;魏晋南北朝为丝绸之路的发展时期;隋唐时期为丝绸之路的繁荣鼎盛时期;宋元时期为丝绸之路的转变时期;明清时期为丝绸之路的衰落时期,勾勒出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概貌,为今后丝路贸易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辟专章对宋元时期丝绸之路进行了探讨,是目前所见对这一时段丝绸之路较为专门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了一些超越前人的观点和论断。例如作者认为西夏的抄劫,使得贡团和商队的往来大受影响,虽然没有完全隔绝,但是贸易的线路和贸易商品的流向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远距离长途贩运为特点的丝路贸易因为基本条件得不到保障而衰落了。^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作者认为宋代丝绸之路贸易仅仅缩小为中原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互市贸易,此说法有待商榷。总体来说,《丝绸之路贸易史》有关宋代丝路贸易史研究存在如下不足:将宋代陆上丝绸之路贸易史仅仅局限在中原政权与西夏、唃廝囉等民族政权贸易的层面上,尚未将宋代丝绸之路贸易史放置在中西交流的视野下予以考察,混淆了区域经济社会与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的区别;此外研究的体量略显单薄。宋代陆上丝绸之路贸易史有其极其复杂的国际和国内背景,贸易的形式和手段也较前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一些现象不容易观察出来,而非简单西北少数民族互市贸易所能概括。

长泽和俊在《丝绸之路文化史》一书中辟专章讲述突厥人在陆上丝绸之路中的作用与地位问题,其中涉及到回鹘、伊斯兰教等论题。^②深田久弥和长泽和俊还专门就西夏时期(唐古特)的陆上丝绸之路进行了阐述。^③这些论著无疑是较早关注宋代陆上丝绸之路的成果,虽然是一些概括式的阐述,但具有极大的学术史价值。

由于宋代陆上丝绸之路的状况与回族的形成与发展关系甚大,因此在邱树森主编的《中国回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一章《唐宋时期的回族先民》“两宋、辽、夏、金时期的回族先民”部分涉及到喀喇汗王朝与辽、夏、金等政权的关系、两宋与伊斯兰国家和地区交往等内容,实际上将回族的形成问题放置在丝绸之路史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具有一定的学术创见;但由于丝绸之路的研究并非是本书的要旨所在,因此该书所论述的有关这一时段丝绸之路的内容多为引述之功。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虽然冠名以资料汇编,然而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资料本身,诚如周一良在《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序言中所言:“我国学者中,筚路蓝缕开创中西关系史研究者当推张星烺先生。张创始于20年代的《中西交

① 李明伟主编《丝绸之路贸易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92~493页。

② (日)长泽和俊:《シルタロード文化史》,白水社,1983年。

③ (日)深田久弥,长泽和俊:《シルタロード過去と現在》,白水社,1980年。

通史料汇编》煌煌六卷巨著，参考西贤成果，辅以新知，举凡交通路线、人物往来、物产传播等等，无不囊括。虽名为交通，实即为文化交流之内容。”^① 在该著作中，张星烺对五代及宋代时期中国与欧洲、阿拉伯、波斯、中亚、印度等地区的交通史料进行了缜密地考索，成为今人研究丝绸之路的资料基础及参考。

二、五代、宋时期中原政权与陆上丝绸之路

除了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以外，大陆学者对五代、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关注和探讨基本上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② 例如周伟洲的《五代时期的丝绸之路》^③（《文博》1991年第1期）客观梳理了五代时期西方诸蕃与中原政权之间的交往状况，指出就在国内处于分裂割据之时，丝绸之路并没有断绝，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各种政治原因，驱使着丝路沿途的各族和中西方使臣、商人，克服重重困难，或另辟新道，或武装护送，始终保持着丝路的通行。笔者认为这篇文章的价值不在于对于具体史实的考辨，而是提出了五代、宋、辽、金时期依然是陆上丝绸之路重要发展阶段的观点，引起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段陆上丝绸之路的关注。因为在此之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唐末、五代以来，由于受到割据政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陆上丝绸之路基本呈现断绝的状态，很少关注这一阶段陆上丝绸之路。例如，1987年岳麓书院出版的方豪《中西交通史》对这一时段的陆上丝绸之路基本上未涉足。此后，莫任南《五代宋辽金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西北史地》1991年第3期）一文，通过对中西使者、商旅、僧徒的交相往来，中西交通路线和商业贸易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内容的阐述，论证了五代宋辽时期陆上丝绸之路仍然在履行着自己的历史职责，对中西文化交流继续有所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孙修身《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和中原王朝的交通》（《敦煌研究》1990年第1期）、《试论甘州回鹘和北宋王朝的交通》（《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对甘州回鹘在陆上丝绸之路上的作用与地位进行了全面梳理，并且用大量的篇幅讨论了灵州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这些成果基本上代表早期学界对于五代、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认识和看法，为后来的研究创造了条件。围绕回鹘与丝绸之路的问题有一些成果发表。如樊保良《回鹘与丝绸之路》（《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回鹘与吐蕃及西夏在丝路上的关系》（《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陆庆夫《论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的贡使关系》（《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钱伯泉《西州回鹘国在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新疆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等。大体上围绕回鹘与中原王朝的交往状况、回鹘对维护丝绸之路畅通所

① 见黄时鉴《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页。

② 最早关于宋代陆上丝绸之路的成果是刘兴唐的《宋代陆上的国际贸易》，《文化批判》1932年2卷第4期。此后学者们就宋代丝绸之路问题主要关注两方面内容：一是宋代的海上贸易问题；二是宋代的香料贸易问题，研究者多是从海外贸易的角度进行论述的。因此，以上两点基本可以归结在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范畴内。虽然也有零星反映宋代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如周一良的《新发现十二世纪阿拉伯人关于中国之记载》（《思想与时代》1947年第41期），但学术界开始进行宋代陆上丝绸之路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

③ 事实上，在周伟洲先前出版的《唐代党项》一书中就对西路党项与中西交通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五代以来灵州成为丝绸之路重要据点，是为唐末五代以来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变化之一。参见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118~134页。

做的贡献、回鹘的地缘政治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等问题而进行阐述或讨论。

日本学者长泽和俊是较早关注五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的学者,发表了一系列与之有关的论著《吐蕃之侵入河西与东西交通》、《唐末、五代、宋初之灵州》、《五代、宋初河西地方的中继贸易》、《高居诲之于阗纪行》、《继业之西域行程小考》、《王延德之〈使高昌记〉》、《关于马可波罗所通过的河西以东路线》等。^① 这些成果主要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讨论了五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的路线变化及走向,大体可以归结为三部分内容:一是讨论灵州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与作用;二是吐蕃入侵与丝绸之路贸易网的扩展;三是通过宋人西行记录来考察丝绸之路的路线走向。长泽和俊是较早成篇论述五代以后丝绸之路中继贸易的学者,从贸易客体的角度指出了五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的变化所在。长泽和俊是一位具有较强的文献解读和解释能力的学者,尽力在有限的文献资料中探寻出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上述这些研究成为此后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参考。后来一些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延展性的讨论,如罗丰《五代、宋初灵州与“丝绸之路”》(《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对通过灵州以朝贡为中心的中继贸易进行了考述;杨蕤《北宋时期陆上丝路贸易初探》(《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在探讨北宋时期诸蕃与中原朝贡贸易、中继贸易的基础上,总结了北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回鹘时代”、“中继贸易”等鲜明特点。

北宋熙宁开边以后,于阗进入中原的道路畅通无阻,掀起了一个朝贡贸易的小高潮“熙宁以来,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② 笔者统计北宋时期于阗向中原朝贡43次,尤其从元丰年间开始,于阗成为主要的通过陆上而来的朝贡者。^③ 学术界就于阗与中原政权的贸易商品、文化交流、贸易路线等内容进行了探讨。如殷晴《古代于阗和吐蕃的交通及其友邻关系》(《民族研究》1994年第5期)、《唐宋之际西域南道的复兴——于阗玉石贸易的热潮》(《西域研究》2006年第6期),任树民《北宋时期的于阗》(《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林梅村《于阗花马考——兼论北宋与于阗之间的绢马贸易》(《西域研究》2008年第2期),杨瑾《于阗与北宋王朝贸易路线初探》(《新疆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等。在一些相关的论文中也涉及到五代、宋陆上丝绸之路的内容。如张俊彦《中古时期中国和阿拉伯的往来——兼论中国和阿曼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张铁伟《“丝绸之路”与中国和伊朗历史上的友好交往》(《西亚非洲》1981年第4期),马雍《萨曼王朝与中国的交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3年第3期),江天健《北宋时期与西方贸易诸国陆路贸易》,^④ 孙振玉《试论10世纪高昌回鹘王国在中亚历史中的地位》(《西北史地》1990年第1期),杨怀中《宋代的番客》,^⑤ 姜伯勤《敦煌与波斯》(《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许序雅《萨曼王朝统治时期中亚的商业贸易》(《贵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李华瑞《宋初丝绸之路上的交往》(《丝绸之路》1995年第5期),殷红梅《喀喇汗王朝与中原的贸易往来》(《新疆地方志》2000年第3期),田卫疆《北宋时期西州回鹘相关史实考述》(《西域研究》2003年第1期),李云泉《略论宋代中外朝贡

① 这些论著先前已在日本发表,20世纪70年代曾在日本结集出版。本文参考的是〔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② 《宋史》卷四九〇《于阗传》。

③ 杨蕤《北宋时期陆上丝路贸易初探》,《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

④ 台湾历史学会编《史学集刊》第18期,1986年9月。

⑤ 杨怀中《回族史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

关系与朝贡制度》(《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殷晴《唐宋之际西域南道的复兴》(《西域研究》2006年第1期)等。

也有学者从另外的角度对五代以来陆上丝绸之路的状况进行考索。如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外来商品辑考》(《中华文史论丛》第六十三辑),从商品流通的角度来考察丝绸之路的状况。张广达《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般次和使次》,^①认为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交通往来的特色是依靠不定期的般次,其中包括从事贸易的般次和星骑、使人往来的般次。荣新江《敦煌文献和绘画反映的五代宋初中原与西北地区的文化交往》(《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通过敦煌保存下来的文献和绘画材料,探讨了当时中原与西北地区的文化交往,论证了虽然分裂割据的局面有碍各民族间的交往,但文化的传播却是无法割断的。荣新江《清明上河图胡人形象解析》,^②通过对画面的仔细辨认,得出牵驼人应该是胡人的结论。这对于考察宋代陆上丝绸之路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启发;王文成《丝路贸易与北宋白银货币化》(《云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考述了北宋丝路贸易中的白银流通状况,认为丝路贸易中的白银流动为宋代白银货币化产生了某些经济的影响。

在丝绸之路路线考订方面的成果有:周伟洲《古青海路考》(《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梳理了北宋时期青海路的基本走向及基本状况;陈守忠《北宋通西域四条道路的探索》(《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考述了北宋时期灵州道、夏州道、泾原道以及青唐道的概况;殷晴《古代于阗的南北交通》(《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论述了历史时期围绕塔里木盆地周边交通路线及其相关问题;祝启源《唃廝囉政权对维护中西交通线的贡献》(《中国藏学》1998年第1期)认为丝绸之路北道被西夏控制以后,许多商人苦于西夏人的盘剥而改走青海道,唃廝囉政权千方百计维护道路的畅通以获取经济上的利益;钱伯泉《〈西天路竟〉东段释地及研究》(《西域研究》2003年第1期),指出西域的伊州、高昌、焉耆、龟兹、割鹿、疏勒分别都是各民族建立的互不统属的地方政权,对于理解西域与中原及辽朝的交通很有帮助;许序雅《古典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所记欧亚陆路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3期),通过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结合汉籍记载,考辨了9~10世纪自地中海到中国的陆路交通路线。宋代西南地区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与西方的交往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蓝勇《唐宋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传输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对于唐宋时期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范围、贸易形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对于梳理宋代从西域进入西南地区的丝路贸易有一定帮助,目前尚属于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

三、辽、金政权与西方世界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西方世界”是指包括西域在内及其以西的广大地区。日本学者长泽和俊在《论辽对西北路的经营》、《辽代吐蕃遣使考》^③等文中从汉文史料所记载的诸蕃朝贡、军事征伐等角度勾勒出辽朝通往西域及河陇地区的历史地理及道路状况,是较早关于辽代

① 见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② 见《新疆日报》2009年6月23日第11版。

③ 见〔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丝绸之路史研究》。

丝绸之路的成果。辽朝军事攻伐西北诸蕃的路线是否与漠北丝路商道完全吻合是长泽和俊尚未交代的问题。此外,长泽和俊也未曾注意辽时居延通道的存在。事实上,居延通道是辽朝及西夏等政权与西方交往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商道。这个问题王北辰在《古代居延路》(《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一文中进行了探讨,指出宋辽时期王延德以及耶律大石的西行均循居延路。辽朝与高昌回鹘进行政治、经济交往是利用居延道。当然,应该指出的是,居延道并非是辽朝与西方交往的惟一通道。钱伯泉《耶律大石西行路线研究》(《西域研究》1999年第3期)指出,耶律大石的西行路线为借道西州回鹘国,沿天山北麓西进。出西州回鹘国境后,西北至叶密立城。三年后,又由叶密立南下伊犁河流域,再西进八拉沙衮城。此外,苏赫、田广林《草原丝绸之路与辽代中西交通》(《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89年第4期)重点论述了辽朝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大食在辽朝陆上丝绸之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不少成果就是围绕大食而展开讨论的。如钱伯泉《大食与辽朝的交往和耶律大石的西征——辽朝与喀喇汗王朝关系史探微》(《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2期),以耶律大石西征为线索,力图论证宋朝的大食多指喀喇汗王朝,而耶律大石靠喀喇汗王朝统治者的让国而发达起来,创建了西辽帝国。钱伯泉在另一文《大石、黑衣大石、喀喇汗王朝考实》(《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中论证了宋代文献中的大石(“大食”)应该是指喀喇汗王朝。杨富学、陈爱峰《辽朝与大食帝国关系考论》(《河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讨论了辽朝与大食之间相互频繁的贸易往来及文化影响。胡小鹏《辽可老公主出嫁“大食”史实考辨》(《西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6期),论证了《辽史》所载可老公主出嫁大食即喀喇汗朝,请婚之王子册割乃卡迪尔汗之子察格里特勤。辽与喀喇汗朝和亲的背景是双方政治经济往来的需要,和亲加强了这种联系。黄时鉴《辽与“大食”》^①论证了《辽史》中记载大食应为中亚的萨曼王朝,并且认为《契丹国志》中的小食国与大食国存在一定关联,可能为唐时的笈赤建国。胡小鹏则在《〈契丹国志〉中的“小食国”考》(《西域研究》2006年第3期)一文指出,《契丹国志》中的“小食国”、“大食国”不存在对应关系,“小食”乃“小石”的异写。宋辽时期的“小食”是以哈密为中心的一个突厥—回鹘集团,独立于高昌回鹘,入元后称哈密力。

回鹘与辽朝通过丝绸之路的交往也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问题。如华涛《高昌回鹘与契丹的交往》(《西域研究》2000年第1期)利用阿拉伯及西文文献资料重点论证了《辽史》中所记的阿萨兰回鹘既非甘州回鹘,也不是喀喇汗王朝,而是高昌回鹘。肖之兴《回鹘后裔在辽朝“共国任事”》(《民族研究》1980年第4期)梳理了回鹘人在辽朝“特殊”的政治地位,有助于分析回鹘与辽朝之间频繁的经济交往。

从考古文物资料的角度来探讨辽朝与西方的联系是辽代陆上丝绸之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主要得益于大量丰富的考古资料,其中以辽陈国公主墓最引人关注,出土了较为丰富的伊斯兰风格的玻璃器皿和其他西来物品。^②学者对这批出土物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如马文宽《辽陈国公主墓出土伊斯兰鏤花铜盆考》^③和他的《辽墓辽塔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兼谈辽与伊斯兰

① 黄时鉴《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② 内蒙古自治区考古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

③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世界的关系》(《考古》1994年第8期),安家瑶的《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玻璃器物及有关问题》^①、《试探中国近年出土的伊斯兰早期玻璃器》(《考古》1990年第12期),黄雪寅的《散落于内蒙古草原上的古玻璃器》(《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1期),李宇峰的《从出土文物略述契丹与中亚的文化交流》^②,傅宁的《内蒙古地区发现的辽代伊斯兰玻璃器——兼论辽时期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2期),这些都文章都试图通过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皿以及其他西来物品中文化因子的分析来论证辽朝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状况。一些西方学者也注意到辽朝与伊朗高原的艺术品交流与相互影响的问题。^③此外,亦有学者从钱币流通的角度来阐述契丹与西方的关系,如卫月望《契丹外交与草原丝绸之路及货币》^④等。张松柏《西域驯兽对辽代的影响及其在辽境的传播》(《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通过对现存辽代有关驯兽的出土文物、佛塔上的浮雕和绘画材料,结合历史文献,分析了西域驯兽在辽代的传播渠道、分布形式及其影响。许晓东《辽代琥珀来源探讨》(《北方文物》2007年第3期)论证了辽代的琥珀原料很有可能来自遥远的欧洲波罗的海沿岸。西瓜传入辽朝及中原是辽时塞北丝绸之路兴盛的重要物证之一,当然学术界对此问题存有不同看法。王大方《敖汉旗羊山1号辽墓“西瓜图”——兼论契丹引种西瓜及我国出土古代“西瓜籽”等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1期),黄盛璋《西瓜引种中国与发展考信录》(《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等论文从考古发现及文献资料等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辽代出土的金银器中包含不少西方文化的因素,是观察辽朝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与西方交往的窗口之一。张景明《辽代金银器中之西方文化和宋文化的因素》(《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齐晓光《耶律羽之墓含域外文化因素之金银器》^⑤、王大方《“人物双狮纹金饰牌”考》(《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2期)等论著探讨了辽代金银器中西方文化的因素。此外,辽墓中出土黄道十二宫图亦是反映辽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一些成果论及此问题。如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伊世同《河北宣化辽金墓天文图简析——兼及邢台铁钟黄道十二宫图像》(《文物》1990年第10期);韦兵《日本新发现北宋开宝五年刻〈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星图考——兼论黄道十二宫在宋、辽、西夏地区的传播》(《自然科学史研究》2005年第3期)等。

辽代丝绸之路的研究还涉及到伊斯兰教传播的问题。马建春《辽与西域伊斯兰地区交聘初探》(《回族研究》2008年第1期),对辽朝与波斯、阿拔斯王朝、伽色尼王朝和喀喇汗王朝的朝贡状况进行了梳理。姜歆等《伊斯兰教在辽朝的传播与发展探析》(《赤峰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通过出土文物分析了伊斯兰教在辽朝的影响和传播。但现在学界尚不能肯定辽朝境内是否存在一定数量皈依伊斯兰教的信徒。

由于蒙古部落的崛起等因素,金朝面临的政治态势与辽朝大不相同,金朝与西方的联系在史料中鲜有反映,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不多。目前仅见刘建丽《略论西辽与金朝及西域民族的关系》(《新疆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一文。

① 内蒙古自治区考古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

② 收入《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北京出版社,1997年。

③ Basil Gray, *Studies in Chinese and Islamic Art*, Vol. II Islamic Art The Pindar Press, London 1987.

④ 收入《辽代货币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⑤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四、西夏政权对于陆上丝绸之路的影响

关于西夏与陆上丝绸之路的问题，陈爱峰、赵学东在《西夏与丝绸之路研究综述》（《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一文中分“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与作用”、“西夏时期的丝绸之路交通”、“西夏与丝绸之路贸易”、“西夏对丝绸之路的经营”等部分对现有成果进行了梳理，因此这里就不必重复了，在这里仅做两点补充：

第一，关于西夏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学术界较为关注的是西夏政权是否阻滞的问题，或者说西夏在丝路史扮演的角色问题，笔者在《关于西夏丝路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再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一文中业已指出：西夏王朝在公元11世纪初攻取了河西走廊，占据了丝绸之路的主动脉，对丝路贸易以及西北地区的交通状况产生了强烈影响。在上个世纪的丝绸之路研究中，学者们就曾注意过这个问题，如藤枝晃指出，西夏兴起，西域诸国通过西凉中转，入宋朝贡，其路径应是避开西夏，向南迂回，经渭州进入宋境。^①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西夏立国西北，河西丝路不通，青海道因此兴起。^②这基本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主要看法。随着西夏学研究的升温以及《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及黑水城文献的逐渐问世，学者们看到了反映这段历史的几条新材料，因此又有一些新的成果发表。如陈炳应、钱伯泉、李学江等。这些研究基本改变了先前西夏阻滞交通、陆上丝路因此断绝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但对比前后两个时期的研究成果，似乎从问题的一端走向了另一端。必须承认，有关西夏时期丝路研究的资料少而又少，认为西夏时期丝路断绝或基本畅通的观点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实事求是地讲，时至今日，这一研究现状也并未发生根本的改观。

第二，有一些研究成果在《西夏与丝绸之路研究综述》一文中并未涉及，兹补充之。孙星群《西夏在中原与西域音乐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从中西音乐交流史的角度诠释了西夏在丝绸之路上地位与作用。陈广恩《试论伊斯兰教在西夏的流传》（《回族研究》2005年第1期）推测了伊斯兰教在西夏境内的传播状况。西域及西来文化对西夏文化到底有着怎样的渗透和影响，尚须进一步关注。

钱伯泉《一场喀喇汗王朝和宋朝联兵进攻西夏的战争——藏经洞封闭的真正原因和确切时间》（《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探讨了以于阗黑汗王为代表的喀喇汗王朝与宋朝为开展和维护丝路贸易与西夏进行斗争的问题。肯定了藏经洞为西夏守军为防止喀喇汗王朝的进攻而封闭。将藏经洞这一敦煌学上的重大问题与陆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进行考察。陆庆夫《党项的崛起与对河西的争夺》（《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论及丝路贸易对于西夏经济的影响。将西夏时期的陆上丝路置于当时西北地区具体的历史情形中予以考察，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考古资料亦可作为观察西夏在丝绸之路定位问题上的一个窗口。如高毅《西夏时期黄河沿岸的榷场经济》，^③通过文物考古资料推测说明西夏向北越过黄河，经居延地区而达高昌是西夏与西域及中亚地区进行经济、文化往来的主要通道。张连喜、马文宽《宁夏灵武磁窑堡出土钱

① （日）藤枝晃《李继迁的兴起与东西交通》，《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1993年。

② 赵荣《青海古道探微》，《西北史地》1985年第4期。

③ 魏坚主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币及墨书“吊”字瓷片》(《考古》1991年第9期)通过出土的一枚喀喇汗王朝的钱币分析了喀喇汗王朝与中原政权、西夏以及辽朝的交往状况。杨富学、陈爱峰《西夏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以黑水城出土文献为中心》^①利用黑水城出土文献,分析了黑水城在经济交流方面“中转站”的功能。利用考古及出土材料对西夏时期的陆上丝路进行研究是今后努力的主要方向。当然,其他语种的文献也很值得关注。例如笔者发现在《突厥语大词典》中就有一些西夏的信息。^②

五、问题与讨论

长泽和俊在《丝绸之路研究之展望》一文中指出“在我们东洋史的研究者看来,具体的尚未解决的问题依然很多。无论是丝绸之路各地的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地名还是民族,都存在着很多不清楚的地方。古代到西域旅行过的人的游记虽然在当时是各个时代的第一手资料,但是在今天有很多地方已经弄不清楚了。另外,作为中亚史主题的在内陆亚洲兴起的和繁荣起来的诸民族与王朝的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出土史料的解读仍极为困难,各个时代的地理书中的地名也有很多与现代的地名不相符合。再说从东西或南北连接这些地区的道路目前也尚未弄清。那么在这条道路上到底有什么样的人进行了往来?流通有什么样的商品?内陆各国如何参与了这样的商队贸易?东西两地区的国家对内陆各国如何进行干涉,或保持往来?他们遥远的国家的神话、传说、民俗是如何得到了传播与交流?各地的艺术又是如何相互影响的?综合了以上各方面的宗教又是如何传入并如何给各地以影响的?等等,有待今后研究的尚未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了。还有在以上植物、动物、矿物等为主的对某个地区的历史发展的研究上,也有不少地方需要与该领域的学者进行合作乃至需要得到他们的帮助。这就是需要进行跨学科领域研究的原因。”^③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到位的分析,这对于丝绸之路研究之展望的看法仍然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在五代、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我们依然需要做许多工作。例如:

民族状况的问题。要厘清五代、宋陆上丝绸之路的状况同样需要梳理西北、西域以及中亚地区民族分布及民族关系的状况,将陆上丝绸之路置于复杂的历史背景之下,然后做一些前因后果的分析,有可能逐步解决出前引长泽和俊所提出的问题。孙鸿《从东北亚地区出土的玻璃器看丝绸之路的向东延伸》(《东方博物》第二十一辑),傅朗云《东北亚丝绸之路初探》(《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都谈及了此问题。

自然环境的问题。一些学者试图通过环境史或者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解释陆上丝绸之路的演变过程。如朱士光、唐亦功《西北地区丝绸之路沿线区域自然地理环境变迁初步研究》^④、郑本兴

① 沈卫荣,中尾正义,史金波主编《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黑水城人文与环境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②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314页)第三卷载“哈通斯尼(唐古特与秦之间的小城市)人与唐古特人作战了,唐古特人击败了哈通斯尼的人们。哈通斯尼的人们呐喊不已,要跟唐古特人和他们的伯克为敌,鲜血似水一般哗哗流淌,红水从脖子挤出了。”此外,在回鹘文书中亦有不少西夏(唐古特)的记录。

③ (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丝绸之路史研究》,第10页。

④ 周伟洲,王欣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三秦出版社,1999年。

《丝绸之路的兴衰与冰川变化、环境变迁的关系》^①等。但目前还尚未发现有探讨宋代自然环境与陆上丝绸之路关系的论著。

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问题。已有学者将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进行对比讨论。如蒋致洁《唐宋之际丝路贸易与海路贸易的消长》(《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5期)、《丝路贸易与海路贸易关系试探》(《兰州商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等论文从陆上丝路贸易的下降、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两宋海路的繁荣等角度论及唐宋之际丝路贸易的变化,涉及到陆海丝绸之路之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尹元超《十字军东征、蒙古军西征与东西方贸易》(《武汉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探讨了十字军东征以及蒙古军西征对于丝路贸易的影响,对于了解宋元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兴衰很有启发。

五代、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外延问题。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东北亚地区出土的大量蕴涵西域文化因素的遗迹、遗物的考察,提出了丝绸之路向东延伸的问题。^②笔者认为这为拓展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就辽朝的丝绸之路研究而言,辽朝与朝鲜半岛以及日本等地区丝路商品交流也应关注。

中段及西段丝路的问题。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可以将陆上丝绸之路划分为东段、中段、西段等内容。由于受到学术资源和资讯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学者对丝绸之路中段和西段部分的研究尚显单薄。就五代、宋这一时段而言,仅有许序雅《萨曼朝统治时期中亚的商业贸易——萨曼王朝研究之二》(《贵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赵汝清《从亚洲腹地到欧洲:丝路西段历史研究》^③等论著体现出这方面的成果。

此外,丝绸之路贸易史与西北区域经济史的联系与区别、丝绸之路研究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丝绸之路具体贸易线路的确考等问题也值得思考和探讨。总之,以上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均具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五代、宋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是一个内容丰富而又十分复杂的大题目。黄时鉴将东西交流史的内容归结为以下五类:一、国家或民族之间的关系;二、民族或人民的迁徙和交融(人种、语言、习俗等);三、中外通道的开辟和交通的方式;四、经济与物质生活方式的交流,生物的传播;五、文化与精神生活方式的交流(语文、传说、宗教、思想、科学、艺术、文学等)。^④以此看来,要全面反映五代、宋陆上丝绸之路的面貌,尚需做许多工作,恐怕也非一代学人所能完成的事情。

(作者单位: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

责任编辑:陈霞 责任校对:李文博

① 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学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② 孙鸿《从东北亚地区出土的玻璃器看丝绸之路的向东延伸》(《东方博物》第二十一辑)、傅朗云《东北亚丝绸之路初探》(《东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4期)也谈及此问题。

③ 赵汝清《从亚洲腹地到欧洲:丝路西段历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④ 黄时鉴《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页。

Peak of Tianshan mountains is very useful for us to think about the dim but import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uthern central Asia at that time.

Key words: Bronze Age, Petroglyph Bogda Peak, Tianshan mountains Saimaly – Tash

A New Exploration to the Cemetery Xiabandi AII in Tash – Kurgan County in Xinjiang

Tan Yuhua (83)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cultural factors of the cemetery Xiabandi AII, this paper confirms that the nature of this cemetery is in general close to Kul'saj type of the late bronze age Semirech'e area, with little similarity to Tazabagjab culture. This conclusion has a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structure of prehistoric cultures in Central Asia.

Key words: Cemetery Xiabandi AII, Pamir, Semirech'e, Kul'saj, the late Bronze Age

Carbon and Nitrogen Stable Isotope Analysis of the Human Bones from the Gumugou

Cemetery in Xin jiang: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early Population

Dietary in Lop Nur

Zhang Quanchao, Zhu Hong (91)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d early Lop Nur population paleodiet using stable isotope ratios of carbon and nitrogen in bone collagen. The nitrogen isotope ratios of bone collagen show that early Lop Nur inhabitants primarily ate animal products including mutton and beef. The carbon isotope ratios of bone collagen show that most plant products came from C3 plant, of which most were wheat. These results revealed the eco – environment of Lop Nur area 3800BP and social economic life and dietary structure, and were of significance for further studies of early agricultural sources usage and development in Xinjiang.

Key words: Lop Nur; Carbon and Nitrogen stable isotopes; palaeodiet

A Study on Golden Key: A Proof of Ancient Sino – 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s

Lu Xiangqian (101)

Textual Research on Famous Food " Camel hoof soup" on the Silk Road Gao Qian (111)

Abstract: " Camel hoof soup" was made of camel hoof. It emerged from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Since the Tang dynasty it had become famous and been considered to be superior dish, being written and praised by writers. It was among " Eight Delicacies" in Yuan Dynasty. To protect from putrefaction in transport, the camel hoof need to be immersed in Red yeast. Camel hoof belongs to connective tissue, so it must be sliced and boiled with lower fire, and then added flavorings to make soup. Camel hoof came from northern frontier of China and become a famous food in inner China because of dietary cultural mergeance on the Silk Road.

Key words: Camel hoof soup, textual research

A Review of Studies on the Land Silk Road in Periods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Song Dynasty

Yang Rui (126)